

# 始共春风容易别

周大新

这些年，我看到的婚姻悲剧不少，听到的离婚故事很多，身边不婚的人数也在快速增加，这让我对婚姻这个问题有了关注的兴致。刚好，熟人家也出了离婚案，于是就有了迷迭的激情，便有了《洛城花落》这部小说。

小说公布了一对夫妻的离婚案情，讲了调解和庭审的过程，但目的不是想评判谁对谁错，只是想通过这桩案子，把我对婚姻的几点认知传达给读者朋友。当然，这些认知不一定都对，读者可以结合自己的感受对其进行评说甚至批驳。简单归结起来，我想传达的内容是：

婚姻不是一座牢固的建筑，它需要通过不断地修缮才可供长期居住。如果把婚姻比作建筑物，它不是钢筋水泥筑就的楼房，可以一住数十年甚至数百年，它像极了的一座茅草房，保质期通常只有2至3年，此后就需要居住的两个人不断地合力修缮，否则，它便会又漏风又漏雨，随后还可能倒塌。

婚姻这座建筑物成为危房时，通常会发出四个信号。其一，生活琐事引发了争吵和冷战；其二，情绪失控引发了冲突；其三，身体有恙引发了夫妻生活不和谐；其四，吸引力下降引发了意外事件。发现这些信号就要赶紧进行修补和修缮，不然恐怕就有倒塌的危险。

修缮婚姻这座建筑物的最好材料是爱和宽容，只有它们能黏合建筑物内的所有裂缝。最忌讳恨意和猜疑，这两种东西对婚姻这种建筑物均有强烈的腐蚀性，而且极易迸发火星，从而引燃茅草屋顶，造成火灾。

婚姻这座建筑物一旦倒塌，必然是两败俱伤，不会有无伤者和全身而退者，而且容易伤及无辜。当然，有重伤轻伤之分、内伤外伤之分。有人受的是外伤，能从他脸上、身上看出来；有人受的是内伤，外表看上去完好无损，他自己甚至感觉不到被伤了，可内脏里却“缓慢出血”。容易伤及的无辜者，比如双方的父母和自己的孩子。

婚姻这座建筑物有悄悄变坏的可能，一旦遇到这种情况，离婚或许是脱险的最好途径。婚姻这种建筑物的发明，是人类在管理自己情感和繁衍方面的一个创造。但就像人类所有的创造物一样，它不可能没有缺陷和副作用。婚姻这种建筑物的缺陷之一，是它可能被其中一方用金钱、权力、暴力和其他强力悄然改建为“围城”。离婚制度的确立，是对这类潜在改建行为的一种纠正。

压根就不进婚姻这座建筑物的人，固然可以自诩逍遥自在，但也造成了另外的遗憾，那就是尝不到婚内那种迷人的亲密感和安全感。而且不婚的人，在抵达中年和老年之后，常会感受到加倍的孤独和不安。

这世上关于结婚和离婚的小说太多了，没有谁能通过一部小说来把婚姻这桩人生大事说清楚，我自然也不能。我能做的就是通过这部小说给读者朋友们提个醒：虽然爱情有多变的特性，很难陪伴我们一生，但它的确实存在于我们的人生过程中，请不要错过享受它的机会！

《洛城花落》是我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从此我就要告别长篇小说写作了。与这种小说样式作别，不是因为她对我没有诱惑力了，主要是因为我的精力和体力不行了。年轻的时候，20万字对我就像一个丘陵，不用多长时间就可以翻越过去；可年纪大了之后，20万字对我就像一座高山，我得用几年时间才能爬到山那边。罢了，人得学会撤退。

（作者系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



## 《群山呼啸》再现大别山革命岁月

本报电（张天一阁）近日，作家季宇长篇小说《群山呼啸》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小说讲述了清朝末年，在大别山腹地小城“霍川”，贺、卫两家三代人因一场震惊朝野的谋杀案而展开的恩怨情仇。当大革命的浪潮涌来，各方势力在霍川明争暗斗，两大家族的子孙也纷纷投入不同阵营，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较量。当红色革命的风暴吹遍群山，霍川的有识之士终于看到曙光，贺廷勇、费伊蓉等一批青年才俊毅然投身红色革命，为信仰和理想投笔从戎，为民族和国家的未来浴血而战。《群山呼啸》以“大别山”“家族”“红色革命”“抗日”为关键词，讴歌了一代中国人理想信念而奋斗的家国情怀，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图景。

在写法上，小说以人物的块面结构取代传统的线性结构，同时以第一人称娓娓道来，以探索家族史的方式完成宏大的家族叙事。

了全民族、全世界的声誉。再如美籍华裔学者刘绍铭1970年出版的《曹禺论》，是他1966年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有关曹禺剧作所受外来影响的见解颇有可取之处。台湾学者胡耀恒，韩国学者韩相德、李康仁等的博士论文也以曹禺为研究对象。这无疑表明曹禺及其剧作在海外学人心目中的价值，也预示了未来海外曹禺研究还有更大开拓空间。

## 堪称中国话剧一代宗师

曹禺剧作最早登陆日本，又在上世纪50至60年代受越南、苏联和东欧诸国关注，上世纪80年代集中在美国上演，上世纪90年代被韩国大量译介，与国家间的文化、地缘、政治关系等有十分密切的联系。此外，曹禺剧作在海外的传播也存在偶然因素。倘若不是武田与竹内两位将剧本推荐给杜宣，1935年《雷雨》在东京的演出也许就不会发生。再比如说，倘若没有费希尔教授在南开大学的热心指导和多方联系，恐怕也就不会有南开学生剧团的赴美巡演。

但自另一角度看，偶然之中又包含了某种必然。我们注意到，随着海外剧评人和研究者对曹禺剧作认识的渐趋深化，对曹禺作为剧作家的评价明显呈上升态势。

以日本的曹禺研究为例。早期的评论其实并非都是称誉，1937年，土居治就认为曹禺的《雷雨》《日出》“不过是习作而已”“不能给予过高的评价”；但佐藤一郎1951年发表的《关于曹禺的〈雷雨〉》则认为：“曹禺是中国现代戏剧的确立者和集大成者”，他“吸收并消化了丰富的西方现代戏剧传统元素，在此之上形成了他中国化的独特风格，进而创作出具有世界性价值的一系列作品”。应该说，佐藤一郎的上述见解的确表现出某种前瞻性，也从一个侧面证实：我们对曹禺及其剧作的认识越是深入，就越能感受到他作为一个剧作家的伟大之处。美籍华裔学者刘绍铭也曾认为曹禺剧作“浅薄”，但1980年在美国与曹禺会面后，他坦言：“如果我今天重写《曹禺论》，我对他剧作的评价，会高许多……在中国话剧史上，他实在是一代宗师。”

因此，真正决定曹禺剧作走向世界的必然性因素，是其本身所蕴含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是曹禺作为剧作家的卓越才华。正是曹禺剧作的丰厚底蕴，决定了它外行可观热闹，内行能窥门道。关注社会问题者不难从中看到封建家庭的专制，希望了解人心者也可感受到人性的多样与复杂，而喜爱戏剧创作者则可将其作为学习的范本，导演、演员更将排演曹禺剧作视为荣誉，尽全力于二度创作中一试身手。

这样我们便不难明白，为何《雷雨》会成为中国话剧海外演出场次最多，同时也是外文翻译语种最多的剧作。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本文配图由曹禺之女万方提供。）

# 走向世界的曹禺剧作

邹红

英语世界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1949年、1953年在美上演的《北京人》用的就是曹禺和劳伦斯的整理本，1986年南开学生剧团在美演出的《雷雨》剧本则是费希尔据王佐良、巴恩斯译本改编的。

曹禺剧作其他语种的翻译亦颇为可观。田本相在《曹禺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中谈到，《雷雨》除了有英、法、德、意、西班牙语等译本外，在越南、朝鲜、韩国、蒙古等国也有不同译本出版，日本最多。其中越南在上世纪40至60年代翻译出版了《雷雨》《日出》《明朗的天》《胆剑篇》《北京人》；苏联于1961年翻译出版了两卷本《曹禺戏剧集》，收入《雷雨》《日出》《北京人》《明朗的天》4部剧作；韩国在1946年首次将《雷雨》译成韩文后，自1989年开始又陆续翻译出版了《日出》《原野》《蜕变》等多个韩文译本。

与演出、翻译相伴而来的是海外学人对曹禺剧作的研究。继早期的观后感、剧评和介绍性文章之后，约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海外曹禺研究渐趋专业化、学术化，出现了一批较有深度的研究著述。

海外各国的曹禺研究中，日本学人可谓用力最勤，不仅起步早，涉及面广，而且多有真知灼见。其最有代表性者，如庆州大学教授佐藤一郎在1951到1954年间发表的系列论文，充分肯定了曹禺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地位和融中西于一炉的艺术创造性。年轻一代学人饭冢容，作为日本曹禺研究领域的后起之秀，从1976年以来陆续发表了多篇有关曹禺及其剧作的论文，分析曹禺剧作与外来影响的关系。此外，饭冢容向日本国内介绍中国曹禺研究的文章《关于钱谷融的〈曹禺人物论〉》《最近的〈北京人〉论》以及向中国学界介绍日本曹禺研究状况的《日本曹禺研究史简介》、考查中日话剧交流史的《中国话剧的发展与日本》等，在中日曹禺研究领域都受到重视。

苏联学者B·彼特罗夫为两卷本《曹禺戏剧集》撰写的介绍文章《论曹禺的创作》，全面评述了曹禺的创作道路及作品风格，认为曹禺是一位卓越的剧作家，获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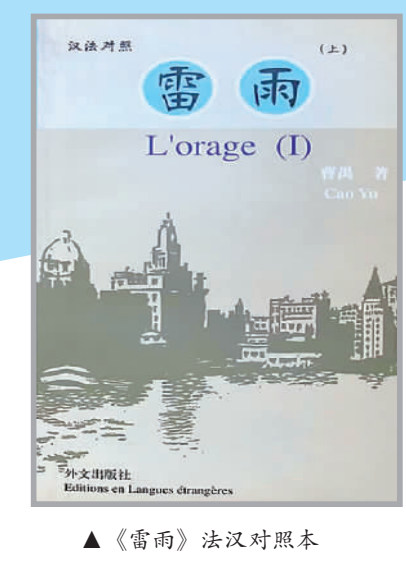
了全民族、全世界的声誉。再如美籍华裔学者刘绍铭1970年出版的《曹禺论》，是他1966年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有关曹禺剧作所受外来影响的见解颇有可取之处。台湾学者胡耀恒，韩国学者韩相德、李康仁等的博士论文也以曹禺为研究对象。这无疑表明曹禺及其剧作在海外学人心目中的价值，也预示了未来海外曹禺研究还有更大开拓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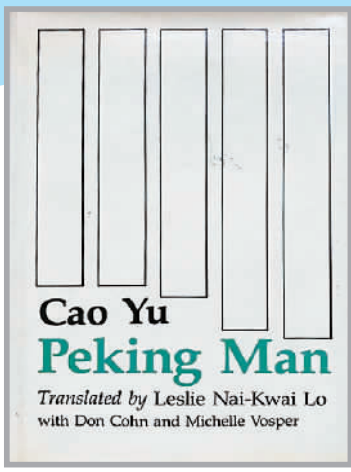
日本民艺剧团在东京用日语公演《日出》剧照

计施救，甚至协调借用缅甸航空投急救包，因为无路可走，张卜最后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作品正是在“幸”与“不幸”的强烈对比中，极富表现力地实现了它的主题意涵。不仅如此，新时代独龙族的新路成为独龙族连通外面精彩世界的彩虹桥。“最后的独龙玫瑰”篇中，1957年出生的董寸莲，“是从独龙江出发走得最远的人”，她走出云南，辗转京津台湾，远赴新加坡，展示独龙族独特的文化。作者以难掩的欢欣之情叙说人物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生行旅，读者从中看到的不仅是物质上的脱贫致富，更可感受到董寸莲们充盈的心灵内存。《怒放》将个体命运的演变置于当代独龙族民族史的流转中加以表现，既避免了主题创作中的同质化，有效呈现出对象的独特性，同时又遵循了非虚构叙事的审美规律，使作品在真实性与文学性间获得了某种艺术张力。

《怒放》既以独龙族整族脱贫作为作品的“本事”，同时又将其设置为叙事的背景，在这个背景中“记录新时代独龙族人民的生活，用文字描摹他们的生活图景”。而这样的图景并不是平面静态的，作者刻意通过独龙族现实与历史的交织、今生与前世的映照、脱贫攻坚主题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纷呈等，做多维立体式动态呈现。读者阅读《怒放》，既可读出清晰的脱贫奔小康的主旋律，同时又可聆听到多声部叙事的丰富性，而这正是独龙族独有的。作品叙事丰富性的获得，有赖于作者写作意图和对象逻辑的预设，也关联着与



▼《北京人》英译本



1934年7月，曹禺处女作《雷雨》发表于《文学季刊》。次年4月，一个由中国留日学生组成的话剧社团“中华同学新剧会”（又名“中华话剧同好会”）将这出戏搬上舞台，27日到29日，在日本东京的神田一桥讲堂连演三场（一说后来又加演了两场），就此拉开了曹禺剧作在海外传播的序幕。尽管这轮演出用的是中文，导演、演员都是中国留学生，甚至台下观众也以中国留学生为主，但提议排演《雷雨》的却是两名日本青年——武田泰淳和竹内好。正是他们在1934年暑期将发表在《文学季刊》上的《雷雨》剧本推荐给中国留学生杜宣，才有了后来载入史册的东京演出。

## 海外演出经久不衰

从1935年《雷雨》在日本东京演出开始，直到21世纪，曹禺剧作在海外盛演不衰，给一代代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海外传播方面形成了与其他现代文学大家不同的特点。

曹禺剧作与日本似乎有着某种不解之缘。曹禺的第二部剧作《日出》，在剧本刊出一年之后，于1937年3月19日至21日在东京上演，地点还是一桥讲堂，演出者也还是一群中国留日学生，而此时距《日出》在上海卡尔登大剧院首演不过一月有余。

很自然，日本成为曹禺剧作在海外演出的重镇。据学者曹树钧《曹禺剧作在日本的演出和研究》介绍，“从1935年到1985年半个世纪之中，在日本本土先后演出过《雷雨》《日出》《原野》《家》《蜕变》《明朗的天》6个大戏，几乎曹禺的主要剧作在日本全都上演过”。其中既有上述中国留日学生的演出，也有国内专业剧团如上海人艺的演出，而更多的是日本专业剧团如东京的民艺剧团、稻之会剧团的演出。新世纪以来，曹禺剧作在日本仍时有上演。如2006年11月，北京人艺首度赴日在东京演出三场《雷雨》；2017年10月和2018年2月，由旅日华人组建的东京话剧艺术协会两次演出《雷雨》。

曹禺剧作在日本以外的亚洲国家也多有演出，如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菲律宾等，尤以韩国和新加坡为最。韩国的情况与日本相似，自上世纪40年代以来几乎上演了曹禺所有重要代表作，且其演出主要为韩语；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则因华人众多的缘故，演出者多为华人社团。

上世纪50至60年代，中国与苏联及一些东欧国家同属社会主义阵营，文化交流频繁，曹禺剧作因此得以登上这些国家的话剧舞台。据相关报道，上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苏联多家剧院上演了《雷雨》，罗马尼亚、捷克、阿尔巴尼亚等国也将《雷雨》搬上舞台，匈牙利则选择了《日出》。上世纪80年代后，曹禺剧作再度受到关注，苏联、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国都有新排《雷雨》上演。

## ◎ 新作评介

# 新时代独龙族的彩虹传奇

——评徐剑、李玉梅报告文学《怒放》

丁晓原

“看一个大国是否有正大气象，紫气东来，看它如何对待弱小民族和穷人；看一个社会是否文明，有无希望，看它如何对待老人、孩子与女人。”这是《怒放》中一段质朴而蕴含宏旨的“序曲”。此言可直抵徐剑和李玉梅合著的这部新作的核心价值。

《怒放》是脱贫攻坚主题写作中的一种，却在众多同类作品中具备吸引我们的异质。《怒放》之“怒”指向作品所写对象的空间。彩云之南，中缅边境，这里有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族是一个独特的“直过民族”，新中国使它从原始社会一步跃进到社会主义社会；而新时代的独龙族告别千年贫困，2018年整体脱贫，“怒放”的是全面实现小康的“独龙族之花”。《怒放》以全息彩绘的方式，将一个传奇用非虚构叙事加以呈现，读者从中可以阅读到一个不一样的脱贫攻坚的中国故事，遇见一种神秘而真实的独龙族风情。

《怒放》的书写对象是特异的，但叙事同样包含了脱贫攻坚书写的基本要素，特

色产业发展、教育扶贫、医疗保障、志愿者帮扶、驻村干部助力等，在作品中都有比较充分的呈现。只是作者对这些要素的展开方式，不是用工作经验总结式或新闻报道式，而是采用贴合客体独特性的叙事叙说。独龙族聚居地山高江险道阻。道路，成为制约独龙族摆脱贫困的障碍。从人马驿道，到独龙江公路建成，再到长达6.68公里的独龙江公路隧道贯通，一条路的历史正是独龙江脱贫攻坚历史的缩影。但作者没有将它做工程化的处理，而是通过人与路命运故事的诉说，反映独龙族人命运的改变和生活的重构。“闹阑炎不再是死神”篇，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大雪封路，家住孔当村的小男孩金学锋患急性闹阑炎，派出所民警一路警车开道，路政交警铲雪清障，小男孩平安到达贡山县人民医院，得到了及时治疗。叙事中，作者有机插叙巴城独龙族烈士陵园中一位烈士张卜的故事。这位深受独龙族群众爱戴的解放军战士，1964年5月在执行任务途中突发急性闹阑炎并且穿孔，尽管军地千方百